

延儒家文明于一线

——20世纪初西潮汹涌下“保守士人”的坚持

张钰翰

自清末改学堂、废科举，至民国废读经，“保守士人”离“时代”越来越远。并不是他们要与时代隔绝，而是时代抛弃了他们。民国以后，“新式”学校既已废止读经，他们也失去了旧日教授于书院、学堂的机会。虽然大多只能僻处乡野，但他们也并非全然安于“退隐”的生活，也都仍然希望以他们这个群体“一己”之力，担负“斯文”，从而延续儒家文明一线于不绝。

1905年，行之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废止。1912年，经学退出学制。这两个标志性事件表明，以经学为核心、以儒家文明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中华文化，已变成不合时宜的“旧”东西，在西方“新”的冲击下失去了生存的空间，面临着支离破碎、趋于消亡的命运。

在西潮汹涌之下，广大的读书人，或主动“拥抱”西学，弃“中学”如敝屣，或趋时从新，随波逐流，几于无不被裹挟进时代的熔炉，而或甘或不甘地向“新时代”大踏步迈进。在这样的压力之下，还有那么一批“顽固”的“保守士人”，或恬退自守，或“低”声疾呼，为存儒家文明于不绝，为保护中华文化的种子，默默地耕耘。

这样的一批“保守士人”，由于站在“进步”的对立面，长期以来是被忽视乃至无视的。这里面，包括梁鼎芬（1859—1919）、唐文治（1865—1954）、马贞榆、曹元弼（1867—1953）、张锡恭（1858—1924）、孙德谦（1869—1935）、张尔田（1874—1945），等等。近年来，所谓“国学”复兴，他们的价值被重新认识乃至接纳，不知是幸也不幸。而在晚清至民国之间，他们保守儒家文明、传承古圣先贤“大道”的苦心与坚持，今日读来，不由令人唏嘘，更深感佩。

面对西方势力的“入侵”，李鸿章曾慨叹“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”，“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”。这股“入侵”，

从西器，到西学，到西制，层层深入，伴随而来的，确实是传统中国社会各个领域深刻的变化。于是，这个传统的古老的帝国，被拖入了“近代”，逐步形成所谓的“现代民族国家”，建立起一套“民主共和”制度。

这种变化是全方位的，但在相当一部分“保守士人”的眼中，西方势力带来的最大威胁，或者说他们感受最深、最担忧的，并不是国体的变更，制度之“维新”，而是纲常名教的衰颓乃至崩塌。诚然，他们中颇有一些人，在民国建立之后以遗老自居，不承认“中华民国”，仍奉溥仪为君主，用“宣统”年号纪年，甚至参与张勋“复辟”；在生活方式上，长袍马褂已是寻常，更有人一直

拖着小辫子。但是，这种“顽固守旧”的背后，很大程度上则是他们对于儒家礼教传统的坚持。

激烈一些的，如昆山李传元（1854—？），面对西学的侵蚀，怒其破坏“大道”，而哀叹于汉宋之学并衰后自身学术之不争，“汉宋并衰，外邦邪说乃起而乘之，黷我彝伦，毁我防检，蠹贼我子弟，禽兽我人民。向之操戈于宋儒者，至此乃纳款于鲁索、斯宾诸人，殊令人气短矣”。而矛头所向，还是西学对于“人伦秩序”的冲击。至于多数“保守士人”，并不完全抗拒西方。如晚年主保皇的张仲忻（？—1913），早年即曾加入强学会，支持变法，在戊戌变法诏下之后给曹元弼的信中，他说，

“今天子本躬行以出治，足以远绍古昔，而因积弱之故，下诏维新，兼采西法。夫西法多与《周礼》相合，而其所以为治者，固仍有其本也。乃一二奇邪之士，厌故喜新，遂谓西法既行，纲常可废，至欲尽弃所学，诚有可为痛哭流涕者”。一方面，他虽然将西法与《周礼》相纠合，予变法以传统之根据，从而为维新树立某种合理性，但仍以为维新变法是时势所需，不得不然，没有断然加以拒绝和反对；而另一方面，他对“趋新”之士行西法而弃儒教的做法又深恶痛绝，以为西法与纲常可并行不废，甚至，纲常更是治国、变法的根本。“盖先王治天下，曰政

（下转10版）➔

（上接8版）

设饗宴招待小时的同门。先祖母让先父拿出众多收藏给大家看。那是先祖母保存了一辈子的先祖父手稿，分类清楚、收藏丰富、保存完好，仲萃先生等人看了大喜，更坚定了出版的决心。仲萃先生在苏州又会见了吴门章氏同门朱季海、沈延国、王秉六等，共商出版大计。旋又回上海，请了山大殷孟伦、南师大徐复、杭大蒋礼鸿这些先祖父弟子来上海，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专家，共同拟定了《关于整理出版〈章太炎全集〉的几点意见》，拟定了《整理体例》，并作了整理校点人员分工，组成了三十人的整理校点团队，其中三分之二皆是先祖父门下弟子，还有一些知名专家学者，我也忝列其中。

离开上海前，他到我家专程看望了我母亲。我当时从师范毕业后，在小学、中学、少年宫教书，没有多大学问，但是家中唯一从文的人。“文革”结束，我有了规划自己人生的机会。而此时正值先祖父全集工作上马，先祖父弟子们希望有个家属代表参与工作，留个传人。我

也有参与全集的意愿，这个意愿完全是出于对先祖父的崇敬，根本不知道工作的艰巨性，就这样参与到这项中作中去了。我先是借调到上海人民出版社，后又转到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。这是1979年底前的事。

仲萃先生跟我说，不要急，一点点做，边学边做，先祖父学问涉及面广，样样都要学，要你马上参加点校是不行的，先从熟悉祖父历史与学问着手，收集他的讲演与医学等等。后来他给我寄来了他当年听先祖父讲演的笔记，《尚书略说》《书序》《古文尚书详说》，洋洋洒洒四大本（《详说》是上下册）。虽然都是过录诸祖耿先生的记录，但却是认认真真一字一句过录，以他清秀略带隶体的小楷，足足过录了四大册，足见他用功之深、问学之严。他做学问就是这样，一部《资治通鉴》读了二十多遍，一篇《西崑酬唱集注》反复打磨了四十年，以持之以恒著称。

在社科院从事先祖父全集编订的工作也让我走上了漫长的治学道路。开始我痛苦极了，孤立无助，无从着手，体会到在高等学府从事研究工作的种种

困顿。我少不了向仲萃先生抱怨，留下了几十通这类往来信件。但在重重压力之下，我反而学到了很多，先后完成《章太炎演讲集》上下册、《章太炎医论集》，完成了《我的祖父章太炎》《我所知道的祖父——章太炎》《章太炎与上海》等专著及编著多册，也算是没有给仲萃师伯丢脸。

《全集》虽然没有设主编，但仲萃先生实际起到了主编作用。他是学术界各方都可接受的人，他默默推动着《全集》的进程，协调了各方关系，他也以身作则完成他点校的《齐物论释》及《齐物论释定本》。但他在1986年6月4日突然溘然长逝了。此后再有十天，纪念太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大会与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杭州举行，这是先祖父逝世五十年后师门的一次隆重聚会，仲萃先生却很遗憾地缺席了。

为太炎先生辩诬

一个再伟大的历史人物难免有不足之处，但有些“缺陷”

是人为栽赃。还历史人物清白，往往是后死之贡献。仲萃先生太了解太炎先生，他每逢与人交流，常常会为先师鸣不平，但他的方式是平和的、说理的。一次他应邀去扬州师范学院作学术报告，这篇报告后发表在《历史论丛》——《太炎先生二三事》。这是我见到他唯一一篇全面评价先师的文章。

首先，他解释了章太炎与孙中山的关系，力排“章太炎反对孙中山”的诬词。他将历史娓娓道来，他说邹鲁写的国民党党史，贬低了“其他力量的作用”，“片面强调了中山先生和黄兴、太炎先生的矛盾，而没有强调他们利益与目的一致”的方面”。他还列举了《民报》经费不足、陶成章被刺等事实，还原了所谓的孙章矛盾的真相，纠正了历史的误传。

第二，他澄清了太炎先生与吴稚晖、谭延闿的历史恩怨。“北伐”成功后，他俩成了南京政府“新权贵”，太炎先生碰到了“这两个冤家对头”，遭到国民党当局“清算”和“通缉”，但这不是“国共合作时期”的事，与反对“国共合作”无关。

第三，他澄清了太炎先生

在一封信中说的“革命军兴，革命党消”八个字，被无限扩大说成是“反对同盟会和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”。他进而澄清太炎先生对袁世凯及黎元洪的认识过程：从章对袁世凯的“幻想破灭”，进而反袁，同时认为袁的作用仅次于蔡锷。并且指出章对黎元洪的评价最终是公允的。他还反驳了关于太炎先生“保守”、“落后”一说，即所谓太炎先生反对甲骨文之论。他说：“我二十多年前去太炎先生家，看到他从抽屉里取出二三片甲骨片，反复抚摸着说‘这大概不会是假的吧’。”可见太炎先生“怀疑的是假甲骨文，对真正的甲骨文他并不怀疑”，因为当时古董商造假甲骨文也确有其事。

仲萃先生对其师崇敬，一生恪守师道尊严，可谓古风犹存，为人之楷模。他的这种厚道，来自对传统的继承，哪怕他对师门同仁，也均如此。他的师弟朱季海先生，一生没有固定职业，但学问很好。仲萃先生每月从薪水中分出一部分给朱季海先生，直到谢世从无间断。请问世上有几君能为之？呜呼仲萃先生！